

■新作聚焦

刘诗伟、蔡家园长篇纪实文学《生命之证》：
以生命见证生命的书写

□叶李

全景式书写武汉抗疫实况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之证》是作家刘诗伟、蔡家园的勇敢“逆行”，该作熔铸强烈的生命在场意识，贯注冷静深邃的省思，是一部向世人奉献的生命之书。

《生命之证》的写作具有文学行动的意味。基于求证、求真的精神和写作立场，作家在写作中尽量捋清事件的动线，尽可能地依据亲历性的体验、多方面采访的记录还原武汉经历的这场生死大劫的来龙去脉，与制造喧嚣的不实传闻形成强有力的对峙。作品开头就讲“一切只能建立在真实与诚实的基础之上”。奠基于“诚”与“真”之上的纪实性写作虽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灾难本身，但却能激浊扬清，以诚探真，恪守文学的伦理，赋予事实尊严，令人重新认识暗夜中的人性辉光，再次擦亮团结、互助、奉献、忘我、爱这些词语，从而抚慰伤痛。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之证》式的写作其实具备了文学治疗功能。

作品中有言：“面对疫情，尤其是特大疫情，人类免不了被打回生命原形。这不是休止也不是终结，倒是有可能以生命为起点，直截了当毋庸置疑地生发和确认真理的逻辑，从而把人类的真理重新叙述一遍”。这是高明的见解，也是令人叹赏的雄心。从灾难叙事当中，人类自不幸里获得机会，回到生命的原形，审视我们的文明之基，将理所当然的生活以及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等级秩序，既有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原则，我们自以为文明的生活方式、信念，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方式重新作为悬而未决之事来审视，把那些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真理放在人类命运的大考面前重新衡量，把那些我们认为已经经过长期社会发展而被证明的部分，再度放回到一种特殊的“元叙事”里重新估量，让这



《生命之证》，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0年第10期

些再次成为问题。我们因此能够重新去发现真理、确认真理，叙述真理的逻辑。

正是在前述意义上，《生命之证》所提供的求证与求真的探索就成为一种介入式的行动，恢复文学对于时代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命运及其生活价值进行追问的能力，文学的“在场感”和“介入性”由此彰显。

两位作者用真诚的写作再次证明文学具有“让我成为一切人，让一切人成为我”的伟大品格。比如作品当中坚守一线、与死神搏斗，“满怀爱意，用温暖的双手，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患者努力渡向生的彼岸”的摆渡人；比如做着平凡而辛苦的工作，却能在危难之时深明大义，主动“涉险”，清理医疗垃圾的环卫工人……读这样的内容令人感动，一是这不是“他们”的故事，“我”的经验与之相通；二是在生命的尊严和完整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生命的根脉始终紧紧相连。作家在作品

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没有刻意以片面的道德判断去取消生活的复杂、人性的丰富，他们所努力的正是使宏观决策到微观层面的集体意识、个人经验乃至个体生命表达都能被看见、被听见。

文学的疗愈不在于救急和知识，而在于培养体贴和同情，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人性善满怀敬意。《生命之证》对两位作者而言也具有上述意义，他们不单作为观察者、采访者去还原事件，摄录他人生活的片影，更是通过写作对自身经历的创痛、对生存之感，对有关现代文明危机的忧患之思进行自我清理，展开自我疗愈，重新思考在世的态度、文明的价值以及个人如何再度以“信”的力量面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正是意识到作家不是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探查伤口，而是与我、与所有人一样承受创伤，困厄对个人的心智、情感的锤击，又力求以个人的探寻和掘进来承担命运的沉重。这是蕴含了共同体意识的写作，这也是两个幸存者为了让文字

配得上我们所受的苦难，不断向着火光奔跑而捧出的心血之作。

“证”也是证词和证言。灾难是最大的荒诞，然而面对荒诞，文学也必须给出自己的证言，以面对社会又内在于艺术之中的方式。证词本就是见证自然与社会的灾难，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历史记录进行补充的重要形式，是我们返回现场的重要凭借和方式。证词保存了创伤的“当时形态”，兼具了精神性、物质性的人类整体伤疤，才真正地昭示了我们曾经怎样生活，又应该如何生活。

灾难应该被生命化、关系化、问题化，灾难造成的伤口应该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敞开，使人类暂时性的受挫能够被置于整体命运的维度，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存在与虚无、必然与偶然、事实与价值、真实与荒诞、有限与无限，并且思考超越之道。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从社会治理层面认真反省，寻求承担现代性后果、补救现代性之弊的方法。匆忙而过度地把创痛转化升华为精神资源和道德源泉，使得创痛本身的深刻内涵、生命之重被轻量化了，这也导致匆忙的克服和草率的升华缺乏说服力。创伤的意义只有在“挟心自食”、一次又一次重返生命之伤，通过对痛苦的体认、反省寻到自新的可能并在降低灾难重复率的行动中产生。灾难书写应该最大程度地恢复人及人类的痛感，应该给创伤和疼痛以它的本体性地位，使其成为重建我们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方法与路径，把生活实感和生存真相还给每个人。

《生命之证》中，所有的“证”最终都落实到了生命层面——生命之证，根本上证明的就是生命之可贵、生命之庄严，就是生命至上。生命之证与生命之思、生命之诗、生命之悟相交融合，抵达的正是文学的丰富和宽广。

■短评

记录小康的可贵地方性收获
——评张雄文《雪峰山的黎明》

□李朝全

张雄文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雪峰山的黎明》，描述的是湖南中西部的一个较为贫困落后地区溆浦县如何摆脱封闭和落后状态，借助发展文化旅游，进而摆脱贫困的过程，为一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一份信史。作品主题正如标题，关注的是雪峰山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新生活的“黎明”，这里的群众将摆脱贫困，开启新生活。同时也是对主人公陈黎明回报家乡、反哺故土的生动描述。

这部作品的特点首先表现在，作者将溆浦的脱贫事业放在我们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来书写和叙述。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处于雪峰山深处的溆浦，由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遭遇洪水等原因，这里的老百姓原先相当贫困。作品中写到，因为资源匮乏，有些地方的猪养了三年还只有七八十斤，这里的很多山民娶不上老婆，打了光棍；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地给人当了上门女婿。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湘西十八洞村提出“精准扶贫”的口号后，溆浦乡村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溆浦县通过扶贫、脱贫，致富三步走，带动全体百姓共同致富，彻底甩掉了贫困的帽子。溆浦的故事是新时代的一段华章，也是一个地域的地方志和一份史志，为溆浦的当代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

的历史记忆。

张雄文注重在历史的坐标上进行考量和思索。书中写到溆浦曾经是屈原流放之地，“入溆浦余怀怆兮”。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最有名的诗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正是带着对百姓困苦生活的万般牵挂，他走向汨罗江，投河自尽。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曾于溆浦转战、暂驻，抗战中的雪峰山曾是中国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的地点，粟裕元帅曾在此浴血奋战。党领导的军队，在这里为人民的幸福、讲求舍生忘死。千百年来，仁人志士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雪峰山区这块热土上的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但是，因为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等各种原因，贫困始终困扰着这里。

雪峰山的脱贫，借重于文化旅游开发振兴乡村，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作品中主人公陈黎明的经历也相当曲折，个性鲜明。作者详细地描述了他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写过诗，后来又去参军，当了基建工程兵，复员转业回家，甘愿舍弃外贸经理的职位而下岗，办起了猪场，创业成功后舍弃了上市公司职位，甘心拿出全部的家底发展雪峰山文化旅游事业，为家乡修

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许金晶

繁生态，而其关注与叙写的连接点则是自然、人性与人类生存境遇的永恒命题。

万玛才旦的《气球》一书收录的小说，在回旋式的对话描写与故事展现之中，充分展现作者对于身处现代化浪潮之下，在信仰与迷失、宿命与挣脱之间踌躇的藏人生活状态的还原。作者既对家乡和族人充满温情，也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对藏人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虔诚与放纵之间徘徊的状态，予以深刻呈现与反思。值得一提的是，拥有作家和导演双重身份的万玛才旦，书中多篇小說已经被改编成电影上映。考察这些故事在文字与影像中的不同呈现方式，同样是阅读本书的一大乐趣。相比之下，同为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谜样的黄昏》则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艺术气质。作者对于语言的运用凝练、讲究而余韵丰富，探求其字里行间的丰富意向，对读者来说，是一种诗意悠远的阅读体验。扎西达娃非常擅长在正能量的生活与故事表达中，将藏族文明在传统与现代、信仰与迷失、虔诚与商业、情感与欲望之间的种种变迁纠葛展示无余，显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与知识分子式的现实关注。

跟扎西达娃传递正能量的生活观类似，新疆维吾尔族知名作家阿斯木在《珍珠玛瑙》一书中，同样以正向价值观的表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阿斯木的小说用流畅而绵密的汉语，讲述新疆维吾尔族居民在当代中国社会里

2020年1月15日 星期五

■关注

李发模长诗《命的边缘》、张婷长诗《喊一声小马哥》等读罢掩卷，回旋在思想精神空间的，是一个有力而低沉的声音，怎么也丢不开——“为什么要写你？”由这思考的自觉而至写作的自觉、行动的自觉，才有可能将写作者和被写作者融入于作品之中，共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将现实的、生活的状态升华至文学的、审美的状态。把“为什么”转化为“写”，不啻认识的功夫、思考的功夫，更是艺术的功夫、文字的功夫，使认识、思想变成文字，变成形象的整体，需要学习、勤奋，还需要悟性、天赋，塑造人物形象、刻画典型情景、充沛情感空间，实现文笔下的栩栩如生。环顾当下，犹需叩问“为什么要写你？”由于身处当下，文学创作要直抵文学的“本真”难度是相当大的，然而，时代历史的纷争中、阴阳中、辨析中、竞争中、各执一词中，总有不惧者砥砺前行，仍然不时涌出有价值的东西，好的文学作品确实让我们欣慰。

黄大发，李发模“为什么要写你？”写好是需费大功夫的，完整故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人与精神，在诗句构成的世界中“活化”，呈现大的历史、时代和物质精神生活，创作者和创作对象之间，是应有全面而充分勾连的。创作者与创作对象一起，在《命的边缘》中勾划这个诗的世界，足见对“为什么”三个字的深刻思考。从中，我们阅读到了黄大发的英雄史诗，也体会到了李发模的精神传略；邓迎香，宋健“为什么要写你？”爱了，就不会收场，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从一个人出发，从一群人（一个村子）出发，人生的千姿百态和复杂内涵一点一滴地呈现在历史里、价值中，其中蕴含的时代的大爱正是这时代的特征和温暖。“兵支书”，小语“为什么要写你？”这是一个群体、一座群像，在这个时代里，置身于这个时代的规定性，按这个时代的步伐向前和作为；马金涛，张婷“为什么要写你？”创作者说，“我为什么写你/是惋惜，惋惜啊/这支和平时时期牺牲人数最多的队伍/又有一位战友倒下/你，再也不能入列”。又说，“整理马金涛的英雄事迹的这段经历让我明白：英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引领。”

作为个体的人、群体的人、“类”的人，在一时一事上，在局部上、全局上，选择如何实现为“人的自由、选择”，问题恐怕不那么简单。俄罗斯诗人勃洛克说，“什么样的人是人？是那些写诗的人吗？不，当然不是。他之所以被称作诗人并不是因为他写诗。”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功夫在诗外”。诗人肯定是要写诗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由之理想，要有独立之精神，要对世界有自己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甚至，要对脚下的花花草草能做到谦卑有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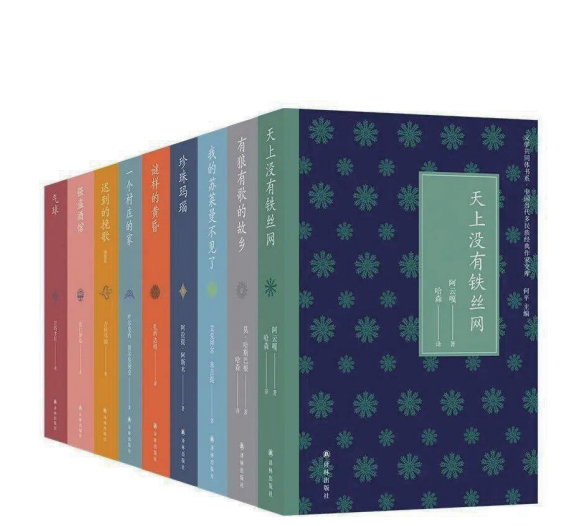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写你？”生活情形、日常细节、职责任务，或是人生情怀、各种机遇、使命激情，这些要素或因素恐怕是必有的，由此创作中的“你”才有可能活起来。以事实为依据的，也是创作的前提和结果。这样一种写作，创作者个人情感的贯注是饱满，感同身受地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世界。这种饱满让创作者思维格外敏锐，能够更大可能从表象向深层突进，获得更多更细更深甚至鲜为人知的奥秘，让读者在富有诗意的文字丛林感受到诗意，我们所说的“典型性”“代表性”也就蕴藉其中，给予读者以文学的、美学的熏陶。

与此相关的是创作者和创作的环境（围绕创作者的一切因素），往往，“爱恨情仇”是一种生活的表现，而支撑其间的和人们一般“需要”“需求”的，却不免错综复杂，倒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善良的人际关系被人们看重。此事、此时，此历史、此时代，始终在这里，“你”是具有穿越性的，不能到来的“明天”会在“你”的身上到来，作为创作者，绝不能忘记这一点。真理的光芒是不可能被遮掩的，创作者的思想、认识、文字和你写的“你”，都将被历史、时代记住。我倒是坚信写作中的“价值”，在“价值”的引领中，“一瞬间跃进一眼清泉/心甘愿被淹没”（《喊一声小马哥》），且不说“此心光明”？

路、架桥。老百姓对此甚为不解，称呼他为“哈协主席”，认为他这个人太“哈”太傻了。陈黎明的文学文化情怀和乡土情怀、百姓情怀，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作者注重刻画人物，讲述故事，采用前后对比手法，表现文化旅游发展给乡村带来的文明新风和社会变革。作者亲临现场，采访深入细致，注重实证的应用。他的行走深入到民间，因此能够采集到许多丰富的地方性的内容，注重突出作品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尤其是注重发掘当地雪峰山区散落着的古村落、古书院、古桥、古庙、古亭、古牌坊、古驿道、古井、古树、古塔、古祠堂和古战场“十二古”的故事。

《雪峰山的黎明》用生动的事例，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贫困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脱贫的路径独特迥异，但是殊途同归，结果和目标都只有一个：摆脱贫困，走向小康。雪峰山区的百姓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向文化要效益，向文化要发展，依靠文化作为强劲的精神支撑和底气，深挖稻作文化、饮食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逐步摆脱了贫困。老百姓通过参与景区的建设，日子逐渐过得红红火火，或者参加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通过资源入股、产业扶持，产品加工、农业合作社建设等而不断受益。有的农民开办民宿，有的从事景区的沱茶、宾馆等服务业，有的担任了环卫人员，有的通过传承花瑶挑花技艺……都从雪峰山的扶贫和文化旅游开发中获益。《雪峰山的黎明》所描述的脱贫经验是独特的，为我国的脱贫攻坚战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溆浦印记。



的生活状态，其中交织着民族特有的信仰、神话与幽默韵味。尽管小说清晰地表达出维吾尔族人在全球共同面临的现代化面前遭遇的种种异化与迷失，但作者用贯穿其中的喻喻式表达和充满亮色的结尾，寄托了对信仰与正向价值观的坚守。

“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经典作家文库”强调“多民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新体现。所谓多元，就是这些作品真实反映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差异性的社会生活状态；所谓一体，就是这些作品清晰还原各民族共同面对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发展任务与国家大政影响。因此正如文库的名称所反映的那样，我们无比期待这套文库以构建文学共同体的形式，在中国各民族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第一感受

白瓷一样的语言

□西元

徐祯霞的散文集《月照长河》显示了作者文字的平和与宁静，像是一个阅尽世事的人。我一直坚信“文如其人”，了解一个作家惟一的路径就是读他的作品，只有把他的作品读透悟透了，你才能真正地看清楚一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当然，这个悟透也不那么容易，就像一个法医，得从种种蛛丝马迹当中得到正确的判断，而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只有真正经历过种种世事沧桑的个中高手，才能通过作品看到一个作家内心深处的世界。

读罢徐祯霞的散文集《月照长河》，给我第一个震撼是，二十几万字的作品当中竟然没有一点杂音。散文家应该更注重语言的质地，可以说，语言美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我甚至觉得，一个散文家的语言所呈现出的面貌就是他的为人。初读徐祯霞的文字，我其实首先想到的是玉，所谓君子如玉。不过，把一个人的文字比作“玉”又太俗了，似乎没有把徐祯霞散文的特点勾勒出来。于是，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件东西——白瓷。白瓷不是雪白如纸那样白、那样精致，而更接近于玉的朴实沉厚。这种瓷器并不闪着取巧的贼光，而是里里外外透露出坚韧结实的大气。合上书，我似乎又有点怅然若失，很久没有读到如此沉稳洁净的语言了。细细想想，整日围裹着我们的语言是多么粗鄙，多么急不可耐，多么装腔作势。他们姿态万千，却都像狂风中无根的野草，很快就消逝得无影无踪。读徐祯霞的文字时，我的心是安稳的，是沉静的，是面对晚霞的静谧与温暖，是面对大海的开阔与安详。

《夜泊秦淮河》写的是秦淮河边、在历史中有名的一些青楼女子，她们生于风尘，却活得惊天动地，铿锵有声，或许这里也有作者祯霞的个人志向，所谓巾帼不让须眉。《月照长河》中给我印象最深，也最让我喜欢的是她写故乡的那几篇散文。从徐祯霞的散文里看得出，她在一个小村子里长大，后又进城生活。记忆里的小村子并没有多少苦难，而是明媚又多有乐趣。村子前有条河，白天男人洗澡，小孩子游泳，夜里女人洗澡，其中穿插许多轶闻趣事，让作者写得活灵活现，意趣横生。但仅仅如此，还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还写在城里生活了很久之后，和家人返回儿时生活之地的情形。此时，小村子将要被改造，小时候玩闹的地方即将被推平，所有童年里的记忆将随着这一切被抹去。她回到自家房前，看到父亲生前种下的那棵丁香树，想起父亲去世前的点点滴滴，以及他对自己种种的爱与温暖。这一段写得情深意切，滋味悠长，颇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意蕴。一个桃花，一个丁香，一个是面如桃花的人，一个是自己的老父亲，此中情绪表达得哀而不伤，让人过目难忘。由此，徐祯霞通过写父亲、写故乡、写童年，其实是在追忆一种已经逝去且一去不返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是什么让她如此难于割舍？当她和家人走在如废墟一般的故土上追忆往事时，恐怕心中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而透过文字，又给人留下了更多思索的空间。

过去，对陕西的印象一直很简单：黄土高原、羊肚巾、绥德的汉子、米脂的婆姨。当然，我也明白，在现代中国，这些农业时代的印象肯定是不准确的。但我说的是文化的印象，我觉得阿宝那种尖利高亢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才是陕西正宗的文化灵魂。可是，读过徐祯霞的散文，更联想到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我悟到了另一种陕西的文化印象。它古朴厚重、多元雄浑，隐隐透露着大唐古都的意味与风采。于是，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徐祯霞写了那么多的历史散文，以及对历史的深重而悠远的思考，因为这本就是她文化血脉之中的东西。